

周代思想界的启蒙特征及其理论谱系

祁志祥

(海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海南海口, 517758)

摘要: 周代思想界具有不同于殷商及以前时期神学蒙昧主义的整体特征, 即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启蒙”。它凸显在春秋战国时期, 发端于文王、武王、周公之道奠定的敬德保民人道传统的西周时期。周代的典籍, 后世疑伪者甚多。研究周代思想史的特征, 有必要对周代古籍的真伪做一个仔细的考量。周代的思想启蒙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与制度原因。它以人性的自我意识、认知世界的哲学意识、精辟的逻辑学思想、专业的游说学思想以及人本意识、道德意识为主要形态, 围绕着“内圣外王”之道, 展开了对“人道”系统的丰富思考与深刻建构, 奠定了中国思想史上的“轴心文明”传统, 对今天的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 周代启蒙; 人的觉醒; 人本人道; 内圣外王; 思想谱系

中图分类号: B82-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5)02-0019-10

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伟大的奠基时代。借用德国哲学家亚斯贝尔斯的用语, 这是一个诞生了许多辉煌思想的“轴心文明”时代。周代思想界的重要特征是以“人本”取代了殷商及以前思想界盛行的“神本”, 以“人道”取代了殷商及以前痴迷的“神道”, 带来了人对自身本性、作用、地位的全面自觉, 呈现出智慧、理性对神学蒙昧的“祛蔽”与“启蒙”。在《先秦思想史: 从神本到人本》一书中, 笔者按历时的维度, 从代表人物、著作的个案研究入手, 翔实地叙写了从上古至夏商神灵至上的神本主义到周代“以人为本”思想启蒙的演变历程^[1]。鉴于周代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思想启蒙成就非凡、令人震撼, 在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非常有价值的现实参考和启示意义, 而过去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 本文试就周代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启蒙”思想谱系的时代特征和理论架构做出提纲挈领的析论与阐释, 以期推动周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与进步。

一、把握周代思想史时代特征的几个问题

笔者以“人的觉醒”为标志, 将周代定位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个启蒙时代。关于周代思想史的时代特征及其思想文明的研究阐释, 存在着诸多亟待讨论的问题, 这里需要逐一加以辨析。

第一, 是周代思想界的时代特征问题。周代思想界有没有不同于此前思想界的时代特征? 一种观点认为, 殷周文化、思想是一体的, 总体上看没有什么根本不同。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籍华裔学者、考古学家张光直, 中国当代思想史家葛兆光。张光直认为: “商周之际, 只有一个文明系统的继续发展, 找不到任何重要的中断与不整合的现象。”^①葛兆光认为: “西周的思想世界与殷商的思想世界, 实际上同多而异少。”^[2]另一种观点与此恰恰相反, 而且阵容更为强大, 代表人物有王国维、

收稿日期: 2024-12-08; 修回日期: 2025-0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哲学后期资助项目“人的觉醒: 周代思想的启蒙景观”(FZB025)

作者简介: 祁志祥, 男, 江苏大丰人, 海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思想史、中国美学史

冯友兰、侯外庐、张岂之、彭林、晁福林、韦政通等。王国维著《殷周制度论》，以大量的文献资料系统论析殷周思想文化之差异，为代名文。他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夏、商二代文化略同。”“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3]这个“新文化”就是注重人道的道德文化。“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周)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3]侯外庐认为殷人没有“道德观念”，道德观念只是周代才有的产物^[4]。其弟子张岂之与乃师观点基本相同，认为迷信神灵的宗教经历了从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到颛顼时代巫祝人员的人为宗教，到夏商以祖先神为上帝的一元神宗教，再到周代以“天”为至上神的一元神宗教的历程^{[5](4)}，但在春秋时代，出现了“重人、重民思想”^{[5](17)}，一元神宗教瓦解，甚至在春秋晚期出现了“无神论”^{[5](18)}思想。彭林指出，如果说殷商是鬼神崇拜的时代，“周则是从鬼道走向人道的伟大开端”^[6]。晁福林指出：“就整体来说，商周之际的思想变革的确是将关注的目光由天国神灵转向了人间民众，周人的‘德’就是这个转变的明证。”^[7]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韦政通在《中国思想史》中，把“人的发现”归功于春秋时期孔子的伟大贡献。

面对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笔者在《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中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扬弃了殷周思想一体论，印证、完善了殷周思想差别论，揭示了周代思想界以“人本”对殷商及以前“神本”思想的启蒙特征。

第二，是否可以以“启蒙”的范畴去认识和表述中国思想史的演变规律，界说周代思想史的特征？有一种成见认为，“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专利，指借用西方民主、科学、博爱、自由、个性等价值理念清除中国古代三纲五常封建道德的蒙昧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没有“启蒙”。另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启蒙”的原初意义指“西方近代的思潮”，“前提是西方中世纪的终结”，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史也不能用“启蒙”加以表述^②。其实，这些观点都将“启蒙”的特定所指与一般内涵混为一谈了。这两种观点的似是而非，从二者之间的势不两立上便可知晓。按照这两种观点的逻辑，20世纪80年代初王元化创办《新启蒙》，学界通常称邓小平开辟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又一次“启蒙”也不能成立。这显然是笔者无法同意的。其实，早在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中，“启蒙”一词就出现了：“每辄挫衄，亦足以祛蔽启蒙矣。”^[8]其意是去除遮蔽、开发蒙昧。因此，《辞海》将“启蒙”解释为“开发蒙昧”，亦即清除荒谬、发现真理之意。思想史是人们对自然、社会、宇宙奥秘、真谛的认识史。这种认识有真实与荒谬、科学与反科学、蒙昧与反蒙昧之分。以此观照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演变，就会发现其中呈现出四次“启蒙”。而每一次“启蒙”都是在蒙昧思潮的历史语境中展开的。上古至夏商流行经不起事实检验的神本主义思潮，于是有了周代贵人轻神、以人为本的启蒙思潮；汉代出现了道德神学化、性善情恶论的蒙昧思潮，于是魏晋南北朝产生了人性平等、自然适性、解放情欲的启蒙思潮；唐宋形成了天理人欲势不两立的蒙昧思潮，于是明清出现了求真务实、回归常理的启蒙思潮；近代接过明清启蒙的接力棒，借鉴西方“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对秦以后整个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下束缚个性、扼杀民权的纲常伦理蒙昧思潮加以反思，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第四次启蒙思潮^[9]。近代启蒙思潮报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五次启蒙思潮。而新时期邓小平面对极左思潮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则可被视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六次启蒙思潮。几千年的中国思想史如同一条滔滔东流的大河，它是由一波又一波的蒙昧与反蒙昧的浪潮朝前推进的。

第三，是否可以“人的觉醒”概括周代“以人为本”的“启蒙”思潮？所谓“人的觉醒”是与“人的迷失”相对的一个概念，指人的自我意识觉醒，能够反观自身，对人类本身的属性、作用及其在宇

宙万物中的地位加以理性的认知。在西方中世纪神学时代，人是听命于上帝的奴婢，世上只有神性，没有人性。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贡献是使人有了对自身本性、作用、地位的自我意识，认识到了情欲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有权利得到满足，认识到人是“宇宙的灵长，万物的精华”（《哈姆莱特》），比神灵还高贵。所以文艺复兴时期被视为“人的觉醒”时代。但“人的觉醒”并不是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专利。着眼于魏晋玄学以“人的主题”对汉代“烦琐”“迂腐”“荒唐”的道德天命化的蒙昧思潮的祛蔽启蒙^{[10](89)}，李泽厚曾将魏晋誉为中国思想史上“真正思辨”的、“理性”的“人的觉醒”时代^{[10](91)}。笔者同意李泽厚在“人的觉醒”的本义上用这个术语指称魏晋思想界的特征，但不赞成他将中国思想史上“人的觉醒”时代下延至魏晋，而主张将周代视为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人的觉醒”时代。周代思想界“人的觉醒”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深刻认识到“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惟人万物之灵”（《尚书·周书·泰誓》，孔安国传：“灵，神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礼记·礼运》）。在宇宙万物中，人的地位最高贵，人的所作所为决定着个人和国家的祸福。人不仅是天地的核心，而且是万物中的神灵。所以无论追求个人幸福还是天下安康，都必须“以人为本”（《管子·霸言》）、以人为先（《鹖冠子·近迭》谓之“先人”）。二是对人性的深刻、丰富认识，诞生了“性善”论（孟子）、“性恶”论（荀子）、“性无善恶”论（告子）、“性兼善恶”论（世硕）；认识到人性是平等的，“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人人都具有道心与情欲的善恶二重性。三是对“人道”的深刻、丰富认识，包括内圣之道与外王之道。这都与人性善恶二重性有关。内圣之道即以理节情，扬善去恶，成为君子、道德上的圣人。外王之道即根据人性来治人，所谓“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韩非子·八经》）。人既有物质欲求，又有精神追求，根据人性二重性来治人，要求“凡治天下，必先富民”，首先保障民生，以满足人的生活欲求；其次要顺应民心，宣之使言，满足“心之官则思”的精神追求。人性又具有向善的理性与为恶的情欲二重性，所以治理天下必须刑德并施，以礼教导善，以法治戒恶。四是外王之道中的“民本”“革命”思想。天下安康的外王之道的关键在于获得万民的拥戴。所以“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老子·第三十九章》）。民，水也，君，舟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民者，君之本也。”（《穀梁传·僖公二十六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士贵耳，王者不贵。”（《战国策·齐策》）如果君主残暴无道，导致民不聊生，臣民就可以运用“革命”的手段诛杀这个独夫民贼（孟子、里革），因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不难看出，以“人道”取代殷商巫史文化的“神道”，是周代思想界的鲜明特征。将中国思想史上“人的觉醒”时代上推到周代，名副其实，言之有据，无可置疑。

第四，是否应当将周代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评价？过去谈周代思想史“人的觉醒”的伟大意义，只是局限于诸子百家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比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把“人之发现”归功于孔子^[11]，张岂之的《中国思想史》只是把“重人、重民思想”视为春秋时代的产物。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忽略了西周的贡献和意义。其实，在《尚书·周书》《诗经》《国语》《周易》中已大量存在天不可信、贵人轻神、敬德保民的思想 and 对于人文之道的探讨。传为周公所作的《周礼》、吕尚所作的《太公六韬》虽然在作者和成书时间上有争议，但将其作为理解周初思想的参考是完全有理由的。《周礼》中“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的主题、《太公六韬》中“仁之所在，天下归之”的思想、《尚书·周书》记载的文武周公之道，是完全一致的，是可以互证的。春秋时期孔子仁学对“人的发现”乃是对周初文武之道和周公敬德保民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孔子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这是孔子崇奉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

文化的自白。杨宽在《西周史》中指出：“孔子的政治主张，主要就是要后世君王以周文王、武王、周公作榜样，从而把西周开国时期的政治文化继续发扬光大。”^[12]因此，笔者主张将周代“人的觉醒”的上限上推到文王、武王，特别是周公时期，兼及成王、康王时期，将东周与西周联合起来作为一个“人的觉醒”的整体阶段，重新确认整个周代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启蒙地位和伟大意义。同时，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再到战国时期，周人的“人本”意识是在与“神本”的传统观念的斗争中不断分化、明确、丰富、强化的。从西周时认识到“昊天不平”“天难忱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到春秋时期认识到“吉凶由人”“祸福人召”“以人为本”，再到战国时期认识到“天人之分”“以人为先”“顺乎天而应乎人”“制天命而用之”，周代“人的觉醒”在大体一致的方向中呈现出了阶段性特征。

第五，对周代“人的觉醒”思想启蒙的社会政治原因怎么看？思想的主体是人。人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之中。人的思想的产生、发展既受制于个体的能动性、创造性，也受制于所处社会的政治环境。过去的思想史著作囿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对上古至夏商周的社会政治制度形态的认识是令人困惑的。其中一个影响很大的观点是中国古代经历了原始公有制社会、夏商周奴隶社会、秦至清的封建社会三个阶段。笔者的研究表明这种观点经不起史实检验，亟须更正。《韩诗外传》指出：“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明代杨慎指出：“三代以上，封建时也”；“秦而下，郡县时也”^③。根据《史记》《汉书》等史料的记载，笔者认为：炎帝至五帝时期是“天下为公”的“公天下”时代，实行的是“选贤与能”的天子禅让制与地方分权而治的封建制。夏商周进入了“天下为家”的私有制时代，天子传承从禅让制一变而为世袭制，但由于天下幅员太广，天子“力不能制”^④，地方行政制度实行的依然是五帝时期分权共享的氏族封建制。分权自治的封建制本质上是不利于维护天子的家天下的。于是，周朝将传统的异姓氏族封建制改造为以一姓为主的宗法封建制，旨在加强周天子的崇高地位和至上权威。但封建的本质仍是分邦列国、分治共享。西周的封建诸侯拥有半独立的自治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被架空，诸侯拥有全独立的自治权。在诸侯拥有半独立自治权的西周时代，“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国语·周语上》）。在诸侯拥有全独立自治权的春秋战国时期，适应诸侯称霸的需要，诸子学说应运而生，百家争鸣、百花竞放。李慎之指出：“历览前史，中国的封建时代恰恰是人性之花开得最盛最美的时代，是中国人的个性最为高扬的时代。”^[13]冯天瑜指出：只有在封建时代才可以呈现“百家争鸣”局面。从思想文化的自由度、人文精神的昂扬而言，封建的春秋战国自有优胜处，作为诸子百家竞放宏议的时代，创造了可与古希腊东西辉映的又一个“轴心文明”^[14]。

第六，如何使用反映周代思想的典籍？当我们引用史料阐述周代思想的启蒙景观时，会遇到一个史料真伪的问题。如果伪书论成立，这些典籍就不能使用。笔者利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6次考古学成果以及周代文献的最新注疏成果，对历史上涉伪的18部周代古籍加以考辨，揭掉了此前戴在《晏子春秋》《文子》《鶡冠子》《鬼谷子》《六韬》《尉繚子》《孙子兵法》《孔子家语》等8部古籍头上的“伪书”帽子，同时认为《司马法》《吴子》《周礼》《鬻子》《尸子》《列子》《公孙龙子》《古文尚书》《墨子》《关尹子》当被视为对周代古籍的辑佚补撰，可以在阐述周代思想时参考使用^[15]。

二、周代“人的觉醒”的历史语境、制度原因与主要形态

夏商的神学蒙昧是周代思想启蒙赖以出发的历史语境。周代“人的觉醒”是建立在对此前盛行的

神学蒙昧思潮的启蒙祛蔽之上的。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尽管经历了“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变，但思想界一直处于万物有灵、鬼神崇拜的神学蒙昧状态。这种状态在无文字记载的夏以前处于传说形态之中，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则有了明确的记载。分析、阐述、总结夏商鬼神崇拜、神灵至上的思想面貌，可为人们认识周代以“人本”取代“神本”、以“人的觉醒”取代“神学蒙昧”提供历史的出发点，或者叫“历史语境”。

周代“人的觉醒”的思想启蒙有其深刻的制度原因。具体说，周代实行的政治分权的封建制是导致周代走向“人的觉醒”的思想繁荣的根本原因。封建共享是“立君为民”思想的产物，与“天下为公”的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与“天下为家”的私有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周代将殷商以前的氏族封建制改造为宗法封建制，天子不再是“诸侯之长”（诸侯联盟的盟主），而是“诸侯之君”（诸侯联邦的君主）。但由于封建制本身具有的分权特质，西周诸侯国拥有半独立的自治权，形成了思想上的半自由。东周封建解纽之后，诸侯国拥有全独立的自治权，思想获得全自由，于是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轴心文明”。

周代“人的觉醒”是从对人的本性、作用、地位的自我意识开始的，涉及人之生死论、共同人性论、人性内涵论、人性价值论、人性作用论、人之地位论。周人认为，人为元气中的“精气”所生，是有“智虑”的生物。人性相同且平等。人性有着情欲与理性的二重性。情欲本恶，理性为善，所以人性有善有恶。情欲虽恶，但作用也大，是人的活动的原动力，只要合理引导，就能产生利国利民的积极力量。理性有知物之明，使人成为道德的生物、劳动的生物、社会的生物、万物的主宰。天地万物，唯人为贵。周代关于人性的系统深刻思考，为周代的“人道”学说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依据。

周代“人的觉醒”不仅体现为人对自身本性、作用、地位的全面自觉，而且体现为人对外在世界的起源、发生、结构、本体的清醒认识。这种认识凝聚为周人对于世界的哲学思考，体现为周代的世界观和认识论。“道生万物”是周代的世界发生论。“宇宙”观与“天地人神”论是周代的世界结构论。道家的“万物之奥”说与儒家的“人伦天理”观构成了周代的世界本体论。道家的“玄鉴”论与儒家的“格物”说构成了周代的认识论。道家强调的“正言若反”与儒家坚守的“中庸之道”则构成了周代的认识方法论。这些都证明了周人理性的自觉及其取得的思辨深度，是对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疑问的最好回答。

周代对人的自我认识和对外部世界的深刻认识在周代的诸子百家学说中有着最充分的体现。周代的“百家之学”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适应封建诸侯壮大自己、称霸天下的政治需要而产生的。战国后期，《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最早对周代“百家之学”做出了系统的总结与评判，是我们今天准确理解诸子学说的原始依据。时过境迁，后人追根寻源，将某些学派的思想源头追溯到了西周之初。今天鸟瞰周代的“百家之学”时，势必需要兼顾后人的整理成果，依托对周代诸子原典的翔实研究，对周代“百家之学”的思想要义、逻辑结构、历史传承进行整体把握，为认知周代“人的觉醒”的时代特征提供必要的参考。

逻辑学，特别是形式逻辑，是人类理性认识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也是人类理性觉醒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以“名学”为名的逻辑学经由《墨经》、惠施，发展到公孙龙，公孙龙成为周代逻辑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公孙龙子》揭示：名与实、指与物既有相称的同一关系，又有不相称的相异关系。这种相异关系的突出表现之一是“白马”非“马”，即个别概念与一般概念之间存在种差，个别概念既属于一般概念，又不等于一般概念。此外，《公孙龙子》还深入认识活动中主体不同感官对同一对象不同属性感知的分离，进而提出“坚白离”的命题。公孙龙的这些辨析使周代逻辑学思想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为周代“人的觉醒”的思想启蒙提供了一个有力佐证。

游说学,周代称为“纵横家”,它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向封建诸侯推销自己的政治学说的技巧和手段,包含着对心理学、修辞学经验、规律的深入探讨。这个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纵横家。在大量游说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鬼谷子》这部周代纵横家留下的唯一专著。《鬼谷子》着重分析随对方心理变动而变动的游说之术,提出了一系列技巧概念。其中,“捭阖”是游说之术的关键;“内楗”指开与阖、言与默、亲与疏、入与出的相生相发;“忤合”指游说者对游说对象的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合”则“捭”“入”,“忤”则“阖”“出”;“反应”指试探游说对象、“知彼”的心理技巧;“飞箝”指因势利导的方法技巧;“揣摩”指对游说对象所处情况的揣度;“权谋”有筹划时的“阴谋”与实现时的“阳谋”之分。如此丰富细致的游说概念和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周代“人的觉醒”、理性思辨具有很高水准的又一证明。

周代虽然出现了贵人轻神的“人的觉醒”,但传统的神灵观念依然存在,其至上神从殷商时期的“帝”或“上帝”演变为“天”或“昊天”。在整个周代思想界,“天”与“人”的概念始终纠缠在一起,在互动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周代的“天”既有至上神的含义,又是大自然的概称。“天人关系”是周代论辩的重要问题。周代的“天人之辨”既包括“神人之辨”,又涉及“人与自然”之辨。周代的“天人之辨”早先承认鬼神存在和至上神的权威,主张“尊天敬神”“以人法天”;后来认识到人间道德与天时、地利的作用,主张“神民俱顺”“循天顺人”;战国时期则普遍认识到了“吉凶由人”“祸福人召”,否认鬼神的决定作用,降低天时地利的权重地位,主张“贵人”“先人”“人定胜天”。在近八百年的思想历程中,周人完成了由“天人感应”向“天人相分”、由“以人法天”向“以人定天”的演变,确立了由“应乎人”决定“顺乎天”的“天人合一”,在“天人之辨”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主导倾向。

人之所以能够决定上自天子、下至百姓的幸福,关键在于人的道德修为,所谓“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所以“德”取代了原来上帝的地位,成为周人心目中的至上神,物化为高高在上的“天”。目睹纣王失德而亡的教训,周初政治家继承尧、舜、禹、汤之道和公刘、古公亶父、文王等周代先王之德,将道德提高到关系天下生死存亡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经过周公、召公的倡导及成王、康王、穆王的努力,道德至上的观念在西周获得了空前的巩固。周代崇德观念是凭借道德的天命化实现的,周人通过制度设计,将德治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周代“大异于商者”的最显著、最突出的特征。

三、周代“人道”的“内圣外王”结构

周代的“人道”不离“内圣外王”的总体思路。周代重人轻神,认为人间的幸福最终由人自己决定,于是有别于殷人热衷探索占卜的“神道”,转而热衷探讨“人道”。周人探讨“人道”是围绕着“内圣外王”的思路展开的。“内圣”指自我道德修养,“外王”指经邦济世。对于士大夫而言,“内圣外王”之道要求坚持正道直行,不同流合污,天下有道就出仕济世,兼济天下,天下无道就深藏归隐,独善其身。对于君主而言,“内圣外王”之道要求以身作则,“成己而后成人”,通过“内圣”赢得民心,称王天下。“内圣”是“外王”的依据,“治人”不过是“修身”的延伸。周代“人道”系统的建构正是按照“内圣外王”的思路展开的。

周人认为修身的最高理想是超凡入圣,但成为“圣人”是很难的,退而求其次,则“内圣”之道集中表现为“君子之道”。西周文武周公之道以仁德治天下,“君子之道”学说应运而生。儒家在继承、综合西周德治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君子之道”。“君子之道”是进德修善之道,所修

道德主要是“仁”“义”“礼”“智”“信”“孝”。道家以清虚无为的道德取代儒家仁义礼智的道德，主张归真返璞、清虚无为，其修身之道主要表现为“真人之道”。周人修身以儒家积极进取的“君子之道”为主，而道家虚静无为的“真人之道”则是补充和平衡，二者构成了周人“修身之道”的完整形态，奠定了后世中国文人儒道互补的“内圣”方式。

百善孝为先。内圣之道包括修身齐家，“孝”就是修身齐家之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道德规范。所谓“孝”，指对父母、长辈的供养、尊敬。周代继承了从上古到夏商祭祖活动中的“孝行”并加以宗法上的改造，从中抽象出自觉的、理性的“孝道”观念。西周的孝道观念在《尚书·周书》《诗经》中有明确的体现。春秋末期，孔子、曾子在此方面做出了重要发展。思孟学派，特别是《孝经》据此提出了以孝平天下的“孝治”观。战国后期，《礼记》《荀子》对“孝道”的规范和内涵进行了进一步补充。与此相应，《左传》《战国策》以赞美的态度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孝行，《吕氏春秋》则综合儒家学说，提出了“务本莫贵于孝”的孝治思想。

内圣修养必须从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入手。重视学校教育对君子人格的培养是周代内圣之道的一个重要体现。在学校教育方面，周代形成了丰富系统的思想，并以相应的教学机构和机制为贯彻实施这种教学思想提供制度保障。西周的教学机构有“国学”与“乡学”、“小学”与“大学”、“辟雍”与“泮宫”之分，教育对象以贵族子弟为主，教学内容是“六艺”。西周的学校教育由官府垄断。到了春秋后期，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创办私学，平民子弟也可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周代的教学理念是“学以致用其道”，其教学方法论及“治人”的教育方法与“治己”的学习方法。为了防止“卑师者不听”，周人提出了“严师”的要求，“师道尊严”的思想由此奠定。

周代的“君道”学说从探讨君主产生的原因、过程入手，确立了“立君为民”“利群治乱”的君主起源论，建立了“君为民主”“代民做主”的君主专制论，“为民父母，养民教民”的君主职责论，“神圣者王，仁智者君”的君主素质论，以及“公平无私，无偏无陂”的君主“王道”论。周代的“君道”学说从君主的产生机制论证了君主的权力与责任、条件和为政之道，与现代政治文明有着若干有价值的相通成分。

“臣”是协助君主平定天下、为天下苍生服务的“辅翼”，既有“君令臣共”、事君以忠的责任，又有“从道不从君”的权利。周代并未出现“君为臣纲”的单向要求，而是设置了“君义臣忠”的双向职责。如果君主失去“仁义”之道，臣子就应当“逆命而利君”；如果君主一意孤行，异化为独夫民贼，臣子就有推翻他的“革命”权利。周代的“臣道”学说从辅君为民的发生机制论、君臣关系及君臣各自的职责出发，强调匡君之邪、“纳善于君”的谏诤之道才是真正的“忠臣”之道。其核心主张是“忠臣”所忠的应是国泰民安之道；明君行道，就从道忠君，昏君悖道，就从道逆君。周代的“臣道”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外王之道中的民本基石，形成了对君主的制衡机制，为现代政治文明提供了不可忽视、不容否定的思想资源。

如果说周代的“君道”论、“臣道”论侧重的是为君、为臣的基本政治理念，那么“君臣异术”论侧重的则是为君、为臣的具体权术。它讨论了君、臣的不同分工与协作互补原则。其思想要义是“因者君术，为者臣道”“君道知人，臣术知事”“上下之分不同任”。“君臣异术”论认为君主虽有独断乾纲的地位和特权，但在行政方法上又切忌大权独揽、专断自为，告诫君主不是全知全能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有限的，不可与臣争功、越俎代庖，必须借助群臣百官的专业特长实现对天下的有效管理。“君臣异术”论是道家“贵因”思想与法家“法术”思想合璧的产物，其重点在于限制“人君自任而躬事”，造成“君臣易位”、天下不治。其中包含着君臣各司其职、互不越界而又互相配合、共治天下的政治智慧。

君主必须通过群臣百官才能实现对基层民众的行政管理,因而选官必尚贤。于是“尚贤”成为周代外王之道中的另一主题。“贤”指才德杰出,依据杰出程度,周人将其分为“英”“俊”“杰”“豪”。周代的“尚贤”说从选拔官吏治国安邦、称霸天下、打破世袭、解放人才诸方面,强调了“尚贤”的重要性,探讨了君主“求贤”“知贤”“用贤”“尽贤”的具体方法和注意事项,于是“举贤”“让贤”成为周代历史上不断涌现的佳话。

无论是“立君为民”的“君道”,还是“逆君为民”的“臣道”,其中都有着一个核心的执政理念——“民本”。周代的“民本”学说涉及如何认识和处理民与天的关系、民与国的关系、民与君的关系、民与吏的关系,提出民为天之本、民为国之本、民为君之本、民为吏之本。“民本”学说是周代政治家、思想家在政治实践中积累的宝贵财富,在今天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本土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民本”理念出发,周人顺理成章地推导出“革命”学说。这个学说源出《尚书》,既是为了给周代商而立提供合法性依据,也是为了给周朝的统治者提出警戒:如果不实行以民为本的仁政德治,像纣王那样作威作福,导致民不聊生,臣民就有“革命”的权利推翻统治者。《尚书》首倡“恭行天罚”、诛“独夫世仇”论。春秋时期,里革公开声称“臣杀其君,君之过”;师旷反诘“困民之主,弗去何为”;管子指出“君不君则臣不臣”,“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文子提出君主“残贼万民”,“何谓不除”!战国时期,孟子提出“诛一夫、残贼”;荀子提出“汤、武不弑君”;《易传》则提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以有道伐无道”的“革命”法理成为周代思想界普遍的共识。

周武王在推翻殷纣王暴政的革命胜利之后,吸取教训,及时进行了政治之道的转换,实行仁政。“仁政”思想不是儒家创立之后才有的产物,而是儒家对周初文武周公之道的继承与发展。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周初确定、西周实行的仁政方针遭到了破坏,仁政主张只是儒家的一家之言,但依然是各封建诸侯国评价政治得失依据的价值标准。周代“仁政”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周武王伐纣胜利归来后,马放南山,偃武修文;周公继之,制礼作乐。周初政治家制定的“敬德保民”方针奠定了西周“仁义之道,满乎天下”的政治传统。进入春秋时期,国君虽无德,但贤臣诸子“以义相支持”,仁德传统“余业遗烈,流而未灭”。战国时期,上下失序,兵革不休,“虽有道德,不得施谋”,但“仁政”更加受到饱受战争煎熬的人民的期盼,被视为赢得民心、统一天下的根本之道。

“仁政”即爱民之政。周代仁政思想的首要主张是“富民”。人民有基本的生活需求,爱民必先利民、富民。富民是仁政之本,也是立国之基。周人认识到,想要富民必须正确处理民富与君富、国富的关系,以民富为君富之本、国富之本,轻赋薄敛,分利于民,避免与民争利。由此出发,重农抑商、开源节用成为周代经济思想的基调。

人不仅有“饥者欲其食”的物质欲求,而且有“心之官则思”的精神欲求。只有在满足了基本的民生需求后顺应民心所向,才能真正获得人民拥戴,实现天下长治久安。周代政治家、思想家主张鼓励民言,健全谏议制度:“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周书·酒诰》)“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国语·周语》)吸纳民言、鼓励民谏、倾听民意、了解民情,是周代政治思想的普遍共识。人生而有欲,有欲则不能无求,扼杀人的自然欲求是不行的,但放纵人的自然欲求也会带来种种社会问题。礼教就是满足人的基本生活欲求而又给予其节制的理性规范。经过周公的制度化建设,周朝的礼教思想达到了相当完备、繁复的境界。周代的礼教思想认为,“礼”的核心含义是“敬”。“礼”标志着宗法等级差异,要求卑者尊贤而“义”,尊者慈爱而“仁”,进而实现各种人伦关系的“十顺”。周礼虽然规定“敬神”,但周礼更多地发挥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能。《仪礼》

和《礼记》规定、阐释了周礼的纵向系统：“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礼记·昏义》）。《周礼》描述、揭示了周礼的横向系统——“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礼。纵横交错、无所不包的礼教之网构成了周代“顺鬼神，合人心，理万物”的根本保障。

与“礼教”一样，“乐教”也是在满足人的欲望的同时又节制人的欲望的一种手段和规范。但较之刚性的“礼教”规范，“乐教”的规范更加柔性化，包含的快乐成分更多，是一种“寓教于乐”的理性规范。一方面，“乐者，乐也”（《荀子·乐论》），音乐给人带来快乐，是为满足人们对于快乐的追求而设计创作的。因此，周代在对音乐形式美规律的探讨和完善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另一方面，乐者，“非极音也”（《乐记》），“乐者，治人之盛者也”（《荀子·乐论》）。音乐不是仅在视听感觉方面给人快感的玩物，而是包含道德、节制人情、实现天下安宁的政教手段。周代的“乐教”学说，“本于太一”“天地之和”的音乐起源论，从“古乐”到“新乐”、从“德音”到“奸声”的音乐历史论，“乐以象德”“声以和乐”的音乐本体论，“管乎人情”“制之礼义”的音乐创作论，“和乐成顺”“审乐知政”的音乐功能论，丰富完整，发人深省。

周初确立了以爱民保民、礼乐教化为主的仁政方针，同时根据治理天下的需要，提出了法治要求，改善了刑法制度。但总体看来，周代的法治思想是服从于爱民保民的仁政设计的。以仁立法，以仁司法，礼主刑辅，以法弼教，“法治”成为周代仁政设计中的一个辅助手段。到了东周，虽然诸侯争霸、礼崩乐坏，但西周的仁政思想实际上仍占主导地位，不仅被儒家加以继承并发展，道家对其也有补充，杂家也有兼取。即便法家、名家公开反对仁政德治，主张严刑峻法，但也打着“仁义”的旗号。仁政之下，礼主刑辅，或打着“仁义”的旗号推行严刑峻法，构成了周代“法辅”思想的整体风貌。

正如周初推行不同于商末暴政的仁政，以礼乐教化为主，但不废刑罚、以法弼教一样，武王伐纣胜利后刀枪入库，转向太平天下的建设，但也未曾彻底抛弃国防建设、军队建设。不过周代的用兵思想是置于“仁义”的大政方针之下的，所以表现为“义兵”思想。《尚书·周书》中替天行道诛“独夫”的“革命”学说是周代“义兵”思想的源头。周初吕尚提出的“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六韬·文韬·兵道》）的主张可视为西周义兵思想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荀子·议兵》），道家主张“存亡平乱，为民除害”（《文子》），兵家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子兵法》），杂家主张“以义为战”，共同汇成了周代以仁治军、以义用兵的思想交响曲。在“义兵”思想的指导下，周代的军事学说总结出许多在战场上取胜的战术规律，彰显着“人道”取胜的时代真谛。

周代以“人的觉醒”为标志、以探讨“人道”为中心的思想启蒙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生命力最强、生存周期最长的历史朝代，奠定了由汉至清中国古代思想的基石，成为后世中国思想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母体和渊源。

注释：

- ① 转引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23页。
- ② 以上两种观点出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哲学后期资助项目“人的觉醒：周代思想的启蒙景观”的结项评审专家。
- ③ 转引自章士钊：《柳文指要》上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 ④ 长孙无忌曰：“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引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十一。

参考文献：

- [1] 祁志祥. 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

- [2]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 第一卷[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34.
- [3] 王国维. 殷周制度论[M]// 王国维集: 第四册. 周锡山, 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24-137.
- [4] 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4.
- [5] 张岂之. 中国思想史: 修订本[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6.
- [6] 彭林, 黄朴民. 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卷[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26.
- [7] 晁福林. 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4): 192-204, 209.
- [8] 风俗通义校注[M]. 应劭, 撰, 王利器,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49.
- [9] 祁志祥. 从先秦至清末: 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四次启蒙[J]. 学术月刊, 2007, 39(8): 96-102.
- [10] 李泽厚. 美学三书[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 [11]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25.
- [12] 杨宽. 西周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4.
- [13] 李慎之. “封建”二字不可滥用[M]// 李慎之, 何家栋. 中国的道路.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0: 209.
- [14] 冯天瑜. “封建”考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227.
- [15] 祁志祥. 先秦古籍“伪书”说清算、正名及反思[J]. 人文杂志, 2021(3): 41-51.

Enlighten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ought circle of Zhou Dynasty and its theoretical pedigree

QI Zhixiang

(Advanced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17758, China)

Abstract: The thought circle of Zhou Dynasty had an overall feature distinct from the theological obscurantism of Yin and Shang dynasties, that is, the feature of enlightenment which is marked by “man’s awakening.” It was prominently manifested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and originated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with the tradition of respecting morality and protecting people’s humanity laid down by the Dao of King Wen, King Wu and Duke Zhou. As for the classics of Zhou Dynasty, later generations were suspicious of their falsification.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Zhou Dynasty, it is necessary to carefully investigate 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books of Zhou Dynasty. The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of Zhou Dynasty has its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and institutional reasons. By taking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human nature, the philosophical consciousness of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the incisive logic thought, the professional lobbying thought, the humanistic consciousness and the moral consciousness as the main forms, and by revolving around the ideology of “Inner Sanctity and Outer King,” it undertakes the rich thinking and profound construction of the “humanity” system, and lays the “axis civilization” trad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hence offering very important inspirations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oday’s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mor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enlightenment of Zhou Dynasty; awakening of the human; humanism and humanity; Inner Sanctity and Outer King; theoretical pedigree

[编辑: 郑伟]